

我的
编辑故事

笨狼何以走进千家万户

□邓湘子

《笨狼的故事》已经陪伴读者走过30余年的光阴,几代人在笨狼妙趣横生的故事里,收获了温暖而难忘的童年记忆。本期刊发作家邓湘子的文章,作为笨狼系列作品最早的读者和见证者,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回忆了笨狼形象的诞生过程、连载时期的编辑趣事,并对汤素兰的童话创作脉络展开剖析。文章既有生动的细节还原,亦有恳切的文学思考,带领我们回到笨狼故事的起点,探寻这一童话形象如何从日常生活与真诚童心中生长成型。

——编者



《笨狼的故事(30周年纪念版)》,汤素兰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



我从少儿期刊编辑工作后,主动拜访并约稿的第一位作者,是汤素兰。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汤素兰发表的文学作品还不多。我读过她在《儿童文学选刊》上的短篇童话《白脖儿和白尾儿》,也读了她的小说《黑色山峦》,那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新写实派风格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5月的《芙蓉》杂志上,艺术分量比她的短篇童话要重得多。因此,在见到她本人之前,我甚至不太清楚她究竟算成人文学作家,还是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应约给我写了两篇短小的童话。大约半年之后,她给编辑部和读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笨狼的故事》来了。

汤素兰最初写出的笨狼稿件,只是三个短小的故事。我们的主编黄丹中老师平时审稿总是一脸严肃,这次读到笨狼的开篇——笨狼在学校参加跑步比赛,信号枪一响,他一口气冲出跑道,冲进了山林里……黄主编忽然哈哈大笑,当即拍板请作者写成系列,把笨狼的故事一个一个个地写下去。就这样,我主持的《小学生导刊(高年级版)》从1994年起开辟了一个专栏,持续发表汤素兰创作的笨狼系列童话。

在编稿过程中,我感觉笨狼这个童话形象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它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那些猎奇想象的童话,没有复杂怪异的情节,也没有脱离现实的“童话境界”。笨狼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中。笨狼像邻家的小孩,善良、热情、天真,好奇好动,又有些笨拙,带着一股傻劲,常常冒出意想不到的奇思妙想,有时把事情办砸了,令人忍俊不禁。

小读者们是否喜欢这些故事呢?那时正是少儿期刊发行的黄金时期,每月有超过一百万名孩子能读到我们的刊物。我们经常深入学校,了解孩子们的阅读状况。跟小读者们聊起笨狼,大家总是很开心。我问:“你们读笨狼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什么?”

“笨狼把家弄丢了……”

“笨狼把雪人背回家里,结果融化了,他还以为雪人跑了……”

“他要把阳光冰冻起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出阵阵笑声,仿佛在讲述一位伙伴的趣事,亲切而温暖。我还了解到,有的班级改编并排演了笨狼童话剧,有的小读者自编了《笨狼之歌》。总之,孩子们由衷地喜欢这个有趣好玩的笨狼。

二

连载故事在发表过程中,编辑部收到了许多小读者的来信。大家觉得故事太短,希望能写长一些,或者每期多登一篇。那时我们的杂志只是一本很薄的小刊物,每篇文章的版面有限,作者不便放开手脚来写。正因小读者对笨狼的新故事满怀期待,刊物上每期发表的故事篇幅,便由原来的两三个版面扩展到了四五个。

孩子们的热情反馈让汤素兰深受鼓舞,她的写作也更加投入。不过,当时她的工作和家务都十分繁忙,有那么几次,到了发稿日期,稿子还没写完。在我的催促下,她交来的稿件偶尔会显得匆促。

有一次朋友们小聚,我当面提到个别稿件存在的不足。从事文学评论的朋友龚旭东听了,讲起一段掌故:金庸写《天龙八部》时在报纸上连载,休假期间请另一位作家倪匡代笔续写。等金庸回来,倪匡对他说:“不好意思,我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看你怎么往下写。”龚旭东建议我,如果汤素兰再催促写出稿件,不妨动手改动一番,让她难以按原来的思路续下去。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意思,就把待发的一个故事改动了结尾,汤素兰居然表示认可。此后,她写出的每一篇稿子都更加认真,决心不再给我改动的机会。

2018年,民建中央机关干部罗锋肩负带领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光荣使命,远赴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乐国窝铺村,出任驻村第一书记。此后三年,他扎根这座塞北偏远山村,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参与、全程见证、全力推动村庄脱贫攻坚事业。驻村期间,罗锋满怀真情记录下一线的所见、所行、所思;历经数年沉淀打磨,推出纪实散文集《驻村记忆》。该书收录127篇文章,共计40余万字,搭配大量实拍配图,铺展开一幅脱贫攻坚时期乡村蝶变的生动画卷。

罗锋笔下的《驻村记忆》,是新时代山乡巨变真实鲜活的缩影。驻村期间,他沉下身子深耕基层,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深入体察乡村现实,与村民交心共情,由此形成对农村发展客观、深刻的认知。书中从多个维度完整呈现乐国窝铺村日新月异的乡村新貌,一篇篇文字带着泥土的温润气息,满是田间地头的生活质感,生动描摹出脱贫攻坚给乡村、百姓带来的全方位改变。

该书最打动人心的特质,在于真实记录山乡人间、还原原汁原味的乡景民情。书中所有篇目均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真切感悟的真人真事,却并未止步于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而是经过文学笔法提炼,兼具纪实底色与艺术质

这个专栏在刊物上连载了好几年,受到孩子们的特别欢迎和期待。笨狼逐渐成为小读者心中非常喜爱的童话明星。

《笨狼的故事》随后得以出版,影响进一步扩大,先后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作为这些故事的第一读者,看到笨狼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孩子们中间形成童话明星般的效应,我为汤素兰取得的成功由表感到高兴。

2008年,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笨狼的故事》单行本十周年之际,出版社专门推出了荣誉典藏纪念版。我作为这些故事的首发编辑,应邀撰写了《一个童话明星的诞生》一文,收录在该版本中。

三

在编发笨狼故事的过程中,我脑子里曾冒出过两个巨大的问号。

第一个问号是,汤素兰为什么能创作出笨狼这个特别的童话形象。见面时,我曾当面问过她,这个形象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但当时她正全力以赴地创作着脑海中不断涌现的其他童话作品,比如《小朵朵奇遇系列》《阁楼精灵》等,还来不及用心总结,因此并没有给出一个让我深以为然的答案。

然而,有一次走在路上,我觉得自己几乎接近了一个更可靠的答案。

那是一个下午,正值小学生放学时分。我去清水塘路办事,路上遇到一拨又一拨叽叽喳喳的孩子,他们背着书包往家赶。这时,我看到一个独自行走的小男孩,随意地背着书包,脚下踢着一颗小石子。他忽然抬头看见我,惊喜地叫道:“邓叔叔,我妈妈要你来接我吗?”我也认出了这个低年级小男生——正是汤素兰的儿子。我说:“木里呀,你自己敢走回家吗?”男孩自信地说:“我敢呢!”我说:“那我就不送你了,再见啊!”“邓叔叔再见!”小男孩快乐地挥挥手,继续踢着小石子往前走。

我回头看着男孩的背影,回想他刚才说话的神态,忽然灵感起来,似乎找到了那个问号的答案。当然,生活原型只是创作的一个元素,但这个元素非常重要。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准确捕捉到生活原型,并将其艺术化地创造出来。

想到这里,我的心怦然一动。我觉得汤素兰在创作笨狼形象时,有效地调动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生命体验——有真实生活和真切童心的支撑。因此,在阅读笨狼的故事时,这个童话形象既幽默、天真、生动,又让人感到亲切、可爱、妙趣横生,更显意味深长。

是的,童话是变形的艺术。汤素兰真诚地将自己人

生中最重要的生命体验,进行了艺术的变形与创造。而这,便关联到我脑海中的第二个问号。

我的又一个问号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如彭学军、翌平、李学斌、薛涛、林彦、陶永喜、陶永灿,还有我自己,写作的文体基本都是儿童小说;而汤素兰却有着特别的选择与表现,以持续不断的童话创作引人注目,这是为什么呢?

汤素兰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正是一篇童话,题目叫《两条小溪流》,刊登在《小溪流》杂志1986年第2期。我了解到,她是在大学四年级时,去其他年级教室旁听了一节儿童文学课之后写下这篇作品的。

我们这一代中国孩子,尤其是乡村孩子,日常生活和阅读资源里其实是没有童话的,汤素兰也不例外。可是,她为什么能写出童话来呢?

这个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恰当的解答,就搁下了。直到2023年底,我在《湖南日报》读到汤素兰的散文《父亲》,这个问题立即被激活了。汤素兰在这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里说,她童年时候,在外做木匠活的父亲带回来一台收音机,她听到了一个感到“震惊”的故事。她写道:“那台收音机的神奇作用,在许多年后显现了出来。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个关于一只蠢猪的故事——《会说话的猪》。那时的我,猪只会让我想到猪肉,我没想到猪还会说话,有计谋,对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意见!这个故事令我震惊,让我从此换了一种目光看家里的一切牲畜。也许,我的童话想象就是那时萌生的。”

“换了一种目光”看世界、看自己,看见的东西便不一样了,从而产生新的感受与发现,激发出新的想象与可能。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惊喜!这应该就是汤素兰童话创作的源头。

追溯汤素兰文学创作的源动力,可以发现,是崭新的观念给她带来了心灵冲击与全新启发,由此埋下了童话的种子,酝酿出全新的创造。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要从观念的改变与更新开始——脑筋一换,地阔天宽,或许就有了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可能。

联想到笨狼这个童话形象的诞生,它或许正是汤素兰“换了一种目光”之后,在审美观念和艺术感觉上凝练出的创造结晶。

笨狼的形象历经时间的沉淀,在3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孩子们所喜爱。它的图书以超过千万册的发行量走进千家万户;它在舞台上化身为大型童话剧,在电视上被制作成系列动画片,在手机里被设计成表情包。或许,它正在一代代读者的见证下,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童话作品。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小溪流》杂志原执行主编)

落笔之处,皆是原汁原味的乡土故事

——《驻村记忆》读后

□贾 霄

感。这恰好印证了“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规律:作者扎根基层现实,将日常矛盾提炼为典型情节,塑造出丰富立体的人物群像,以此传递脱贫攻坚背景下厚重的社会现实。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中,无论是驻村干部罗锋,还是乐国窝铺村的普通村民,平凡日常都被赋予了不凡的时代意义。书中刻画的老王书记、卢建成、王忠杰、王振海、丁大姐、王瑞等乡村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身上尽显新时代农民独有的精神风貌,读者透过这些人物,便能读懂当代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透过《驻村记忆》,我们能清晰窥见作者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三年朝夕相伴的乡村生活,让他熟谙村里大小琐事,熟识每一位村民。作为深度融入乡村的亲历者,质朴的乡土环境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这片与过往生活截然不同的土地,源源不断唤醒他的写作灵感。文字落

笔之处,皆是村庄里真实的日常、鲜活的人物与原汁原味的乡土故事。扎根乡土现实是作者现实主义文风的根基,这份独特的创作特质,源自他独有的观察视角与体察、描摹生活的方式。

书中诸多篇章完整串联起他的驻村历程:初到乐国窝铺村万事从零起步,于是写下《万事开头难》;自制便民入户工具、登台宣讲乡村故事、牵头组建便民服务队;挖掘手鞋垫产业增收渠道、上山勘探水源、为村内农产品代言、推进各类便民基建落地。跟随文字脉络,读者能够完整看见他从熟悉村情民情,到带领村庄全方位发展的全过程。三年驻村点滴尽数铺展于书页,真切、厚重、写实,有血有肉地还原了乐国窝铺村在脱贫攻坚阶段发生的全方位蜕变。

动人之处往往藏在日常平凡的细节之中。串门本是乡村司空见惯的小事,作者敏锐捕捉这一日常场景,在《我爱串门》一文中记录下绘

制《乐国窝铺村居民点地图》的经历。一张地图让他走遍全村,得以清晰掌握每户村民的实际状况。一次次看似寻常的串门,最终化作为民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不少贫困户也依托走访摸排,找到了适配的产业路径,顺利实现增收脱贫。串门这件事虽微小,落地带来的改变却意义重大,形象诠释了从偶然日常窥见普遍现实的创作逻辑。

《小村情报站》一文亦有生动写照:“日出之后,老人们或是搬一把小椅子闲坐,或是席坐屋檐台阶,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位,一待便是大半日,村中大小新鲜事都在此流传。”这里是乡土民情自然汇聚的角落,也成为作者联络群众、摸清村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情报站里传递的皆是细碎家常,汇集到驻村干部手中,便构成关乎全村发展的要事。作者偶然留意到这儿民间闲谈角落,背后却是乡村治理与群众联结的必然写照。

一名合格的驻村干部应当如何履职尽责?《驻村记忆》给出了翔实答案。对待群众要饱含真情,保持昂扬干劲,恪守“八个千万”“六勤”“六心”“四当”工作准则;善于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敢于担当、务实作为,最终推动村庄实现全方位蜕变;特色产业从无到有、村民收入稳步提升、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群众生活愈发便利、乡风文明蔚然成风、干群同心聚力、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文学创作向来以个别映照普遍、于偶然蕴藏必然,以独特的人物形象承载丰厚广阔的社会内涵。遵循这一规律进行书写,才能塑造出个性鲜明、命运各异的鲜活人物,铺展出生动真切的生活图景。《驻村记忆》正是践行这一创作法则的优秀作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依靠的是大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计得失的基层实干者的奋力推进。身为文艺创作者,我们应当用心刻画、热情赞颂基层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与精神底色,向大众展现他们丰盈的内心世界,描摹乡土间质朴动人的人间百态。

合上书卷,望着封面之上乐国窝铺村焕然一新的山乡图景,我由衷敬佩作者扎根基层的实干担当与扎实的文字创作功力,更为新时代华夏大地的山乡巨变由衷喝彩。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百家品书

多年以来,作家徐可一直倡导“散文的古典美”,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坚守中国古典散文传统,做到情、识、学三者统一。他近期出版的《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正是这种新古典主义散文观念的有效践行。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情”,徐可认为:“真情,是散文的灵魂,奠定了中国散文古典美的基础。”《既见君子》之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人物中选了这十位作为书写对象,是因为作者对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或爱、或敬、或理解、或认同的强烈感情。其中,《司马迁的选择》梳理司马迁的一生,聚焦其在人生转捩点的三次重大选择。对于司马迁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力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悲壮抉择,作家深切地理解、共鸣。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隔着两千年的时光遥相呼应、相互致意。《启功夫子逸事状》用平淡的语言回忆启功先生的小事、趣事,从世人对大师的想象中努力还原出一个充满“活人感”的有趣老先生、一位可爱可亲的夫子。启功先生是徐可的恩师,徐可对启功先生感情深厚,对他的离世深感伤悼。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这篇文章,就能体会出一种“以淡笔写深情,以乐写哀”的况味。《既见君子》以孔子这位“万世师表”开篇,以作者的恩师启功先生收束,也再次印证了后者在作者心中的情感分量。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识”,徐可说:“写散文绝不能简单重复前人的观点,要努力做到或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角度、新的表达方式。”其中“新的见解、新的角度”便是“识”,也就是见识与格局。关于郑和,传统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明王朝不惜掏空国库以向世界炫耀国力的好大喜功之举;但这本书中的《郑和的海上和平之旅》却从郑和下西洋中看到了积极意义——与西方航海家“欲求新地以自殖”相反,郑和的七下西洋传递着“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和平外交思想。再如《李渔的起承转合》,一般观点认为李渔“善于逢迎,惯打抽丰”,属于“士农工商”中的“商”,文学史也把他视为背离“文以载道”传统、专注于文本娱乐性的通俗作家。但徐可对李渔则是设身处地地去体贴、去理解,认为他作为最早的职业作家之一,能够在生存、文学坚守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故将他列入“君子”之林。这一理解不苛责、不拘泥,非常具有现代性,充满仁爱之心。在对笔下人物的知人论世中,徐可做到了眼界开阔、见识通透,观点不同流俗。

关于散文创作中的“学”,徐可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底蕴,二是文学素养。就文化底蕴而言,徐可每写一位历史人物,都会亲赴其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考察、感悟;在查阅文献方面更是不遗余力,既要穷尽人物的生平与交游资料,也要精读传主的全部作品及相关重要文论。《既见君子》一书涉猎之广、引书之多,遍及经史子集各部——史部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明史》,诸子百家如《庄子》《中庸》《论语》《朱子语类》,文论类如《文心雕龙》《史记正义》《唐诗绪笺》《西清诗话》,小说笔记如《太平广记》《孔氏谈苑》《曲洧旧闻》等。作者学养之深厚、学问之广博,在当代学人散文作家中亦不多见,其读原典、溯本源的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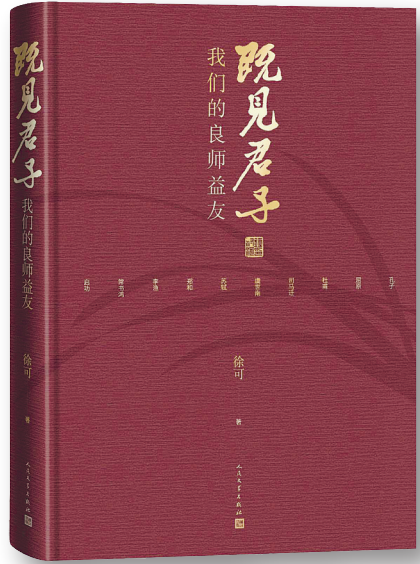
至于文学素养,徐可力图让散文吸收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类文体的优点,不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以《既见君子》中各篇的结构而论:写孔子,取法《论语》的体例,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想象并虚构出场景与对话;写李渔,契合传主的剧作家身份,将其一生结构为“起、承、转、合、尾声”五幕剧;写启功,着重其天真烂漫的名士风度,采用《世说新语》和古代“逸事状”的体例。作者努力让每一篇的形式与人物、内容相得益彰,做到一篇一个样,体现了其对散文形式的苦心经营与力求突破。

关于散文的语言,徐可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读不读古文,运笔便有高下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没有读过《古文观止》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成为一个高层次的中国散文大家。”他的散文语言是质朴、典雅、丰厚、蕴藉的现代汉语——那是一种从文言文中淬炼、从故纸堆中浸泡、从诗词歌赋中熏陶出来的语言。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概括其风格,便是“雅正”。从这样的语言中,你能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旧学根基,感受到他为人文为文的真诚,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君子之风。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

——评《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

□邹世奇



《既见君子:我们的良师益友》,徐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5月